

革命回憶錄

2

革 命 回 忆 录

第 二 辑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汇编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在徐海东身边十四年·····	张金山 (1)
同左权将军的三次会见·····	赵龙韬 (9)
在刘志丹家里·····	魏志清 (15)
记“九·一八”事变前后·····	宋 黎 (20)
难忘的征途·····	苏 风 (48)
回顾满洲省委的一段工作·····	李耀奎 (66)
抗日烽火燃烧在鸡公山上 ——东北中学抗日救亡运动片断·····	张树权 (71)
忆邯郸战役·····	李东潮 (84)
童养媳找红军·····	魏志清 (88)
“学兵连”过草地·····	马大信 (100)
竹沟突围记·····	郭欠恒 (104)
闯虎口 送要件·····	袁 逸 (114)
挺进剧社二三事·····	杨 华 (119)
在敌人据点边夺粮·····	贾英才 (124)
巧袭乌马庄炮楼·····	张志强 (128)
水道攻坚战·····	郑 珊 (135)
裕口镇伏击战·····	李冬雨 (143)
刀插虎腹 歼灭顽敌·····	马德胜 (149)
兴济攻坚战斗中的七勇士·····	李英杰 (157)

在徐海东身边十四年

张 金 山

一九三二年春季的一天，我翻过一座山，走了十里路，来到红四方面军独立四师师部送信。师长徐海东同志看完信后，亲切地问道：

“小鬼，叫么子名字？哪场儿的人？”“叫张金山，湖北黄陂县张家湾的人。”我回答。“你家门口是不是有个碾子？”“咦！你怎么晓得的？”我问。“我家在徐家窑，隔你们那个场儿只五六里远。小老乡，到我这里来吧！”我高兴极了，急忙又问：“做么子事？”“给我牵马。”徐海东同志说着，把我带到门外，指着一匹拴在树桩上的高大骡子说：“张金山，你骑上试一试。”我那时只有十五岁，年纪小胆子大，一纵身骑了上去。他笑了，说：“蛮好！蛮好！”

就在这时，我才注意地看了看师长。嗨！高大魁梧，四方脸膛，浓眉大眼，浑身是劲。看上去只有二十七八岁（实际是三十二岁），他头上的八角帽缀着红布五星，腰间皮带上挎着手枪，腿上打着齐刷刷的裹腿，两手往腰上一叉，真是一个威武的红军将领。我早就听老人们说，家乡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徐海东。他祖上六代都是窑匠，自己做过十一年窑工，打过土豪劣绅，参加过北伐革命，当过农民自卫队长、赤卫队长，是鄂豫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指挥红军把

国民党军队整团整旅地消灭掉，屡建奇功而闻名四方，使敌人闻风丧胆。家乡人亲热地称他“海东哥”，敌人惊恐地叫他徐老虎。国民党反动派抄了他的家，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一族六十多人。敌人到处张贴告示：捉住徐海东，赏洋十万元。

我是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的，以前没见过徐海东同志。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个很厉害的首长。现在见了他，使我感到亲切和温暖。从此，我就编在马夫班里，专门给他喂马牵马。

不久，徐海东同志当了红二十五军军长。他是个爱马的指挥员，骑过从国民党一个县长那里夺过来的一匹白马，也骑过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一匹黑马。在一次战斗中，我们打败了马鸿逵的骑兵，得到了他手下一个旅长的枣红马。这匹马高大肥壮，全身红毛，光滑滑的。徐海东同志很喜欢它，骑上去两腿一夹马肚子，打一个响鞭，马就象飞似地奔跑起来。后来，我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编为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同志送给军团长徐海东同志一匹更漂亮的枣红马。徐海东同志更是喜爱，骑上去两腿一夹，马就地卧倒，听候指挥。原来这是陕北红军骑兵团训练出来的战马。西安事变时，徐海东同志奉周恩来同志的命令，带领军团在驿马关附近一个大操场练兵，准备去打亲日派。那天，张学良派他的军官们骑马前来参观。我把马鞍子备好，牵到徐海东同志跟前。一个军官见了我牵的枣红马，羡慕地对徐海东同志说：

“长官，你这匹马真帅呀！”“你要能骑上去，我送给你。”徐海东同志说罢，叫我把马牵过去给那个军官骑骑试试看。那个军官跳下他的马，来骑枣红马，右脚刚踏上脚

蹬子，枣红马昂起头又咬又尥蹶子，他怎么骑也骑不上去。站在一旁的徐海东同志哈哈大笑起来。

无论是打完仗后还是行军宿营，徐海东同志常常来到马夫班，用手摸摸马头，拍拍马背。有时，他把吃剩下的东西放在手心里喂给马吃。爬山的时候，他舍不得骑马，怕把马累坏了，叫我把东西让马驮着，他和大家一样步行。那时，白天打仗，晚上行军。他再三嘱咐我：“行军途中休息要把马看好，千万别让马跑掉了！”我把他的话记在心上，老是怕马跑。每次行军原地休息，路上没有树拴马，我睡觉时就把缰绳拴在自己的手脖上或脚脖上。如果马要跑了就会把我拽醒。

谁知，担心的事情，却偏偏发生了。那是一九三五年夏天，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回族聚居的地方。宿营以后，到处找不到水。原来，这里一家一个地窖，里面储藏着吃的水。窖上面盖子上锁了，再用土埋着。我们供给部好不容易找到几家，打开盖子从地窖里取出水来，才做上饭，喝上水。晚上睡觉前，我们马夫先把军首长的几匹马拴得好好的，才去睡觉。半夜里，我第一个起来去喂马。糟糕！拴在一根缰绳上的三匹马，咬断缰绳全跑了。顷刻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啊！“是不是在做恶梦？”我心里侥幸地想着。我暗自咬了咬舌头，又用手再一次去摸摸被马咬断的缰绳。“不是梦！”这时，另外两个马夫也起来了。我们三个人就在周围摸着黑找呀，找呀，从半夜找到天亮，一点影子也没有。怎么办，误了大事怎么得了？！到吃早饭的时候了，我们三个人谁也不敢回去。“张金山，你和军长是老乡，军长平时又喜欢你，你先回去吧！”那两个马夫鼓励着我。但我一想起徐海

东同志爱马的那些情景时，我的心就慌得要命。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警卫员远远地跑来喊道：“张金山，你们找马，军长叫我找人。你赶快回去吧！”

我先回去了，一见到徐海东同志，连看一眼也不敢便低下头。心想：首长最爱马，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一定要大骂我一通，还要处分我。我正准备挨批评、受处分，他开口了：“张金山，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额头上大汗珠不断往下淌。警卫员提来一壶开水，徐海东同志倒了一瓷碗送到我手里，说：“先喝水，再吃饭。”我抬起头，望着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孔，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见我只有我一个人，又问：“他们俩呢？”我照直说：“和我一样，不敢回来见军长。”他马上叫警卫员把那两个马夫喊了回来。他怕我们不吃饭，又到伙房看着我们吃。他安慰我们说：“我知道马没有水喝咬断缰绳跑掉了，怎么能怪你们呢？”我们吃着，听着，眼泪掉进了饭碗里。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徐海东同志总是关心下级，爱护部下，患难相助，生死与共，同甘共苦。凡是在红二十五军当过兵打过仗的人，谁的心里都深深地留下这种难忘的印象。他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对战士要求严厉，谁都怕他。可是平时，他又十分和气耐心，谁也不感到拘束。有次战斗结束，徐海东同志和大家一起在河沟里洗澡，他对警卫员说：

“小鬼，过来看看我身上叫白狗子咬了多少窟窿？”我是知道的，他身负九次伤，身上有十七处伤疤，真是个传奇的人。有时，红军筹粮困难，大家把黄豆撒在枯草之中，放火烧草，火灭了，黄豆也烧熟了。徐海东同志和我们一样，把烧糊的黄豆从草灰里一粒一粒拣出来，拿在手里搓一搓，再放

进嘴里嚼起来，吃得满嘴都黑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徐海东同志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一次战斗刚结束，徐海东同志看见公路边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没有抬走，立即从马上跳下来。他问清了那个战士的伤势后，叫人找来一副担架，和另一个同志把伤员抬走了，一直抬到军部医院。这个伤员躺在担架上，当他知道抬他的是军长徐海东同志，热泪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平时行军，徐海东同志看见哪个病号走不动了，他就跳下马来，叫病号骑着他的马往前赶路。有时爬山很吃力，病号骑在他的马上，他就拽着马尾巴往山上走。我看了过意不去，就劝骑马的战士下来。徐海东同志非常不满意，当即批评了我。

一天，徐海东同志骑马行军。他见一个战士走路很费劲，便下马来问他：“怎么样，你病了吗？”那个战士敬了个礼说：“报告军长，我没病。”徐海东同志用手摸摸他的额头：“呀！烧得烫手还说没病，快骑上我的马前进。”那个战士说什么也不肯骑：“军长，我这点小病不要紧，保证不掉队。”徐海东同志笑了笑说：“你不掉队？我们两个比一比走路，谁输了谁骑马，好不好？”那个战士为了让军长骑上马，便答应了。于是，一场军长和战士的走路比赛开始了。只见徐海东同志迈着稳健而有力的步伐，急促地走着；而那个战士咬紧牙关往前赶。比赛结果，军长领先。徐海东同志说：“小伙子，我走十步你掉三步，我走十里你掉三里，今天行军要走六十里，你算算要掉队多远呀？”那个战士很为难：骑吧，让军长走路实在说不过去；不骑吧，又没有理由可讲了。正在这时，只见徐海东同志两只大手一

擎，将战士扶上了高大的枣红马。很快，军长让马给战士骑的故事，在红二十五军广为传颂。

正是因为徐海东同志对待自己的部下亲如手足，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关键时刻，同志们总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首长的安全。行军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常来轰炸和扫射，飞得很低。每当我听见飞机的声音，赶紧招呼：“军长，快下马，敌机来了。”等他跳下马，我纵身上马，朝马屁股打一鞭子，马象飞一样跑出去一二百米。等飞机走了，我骑马回来，再让徐海东同志骑马继续行军。

在一次遭遇战中，红二十五军军部被敌人骑兵包围。眼看敌人追上来了，我们马夫班里绰号叫“猴子”的班长，飞快地把马牵到徐海东同志跟前：“军长，快上马！”徐海东同志一回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骑上了马。“猴子”举起了鞭子：“军长，你要骑稳！”说完，往马屁股上猛抽一鞭，枣红马象箭似地从高粱地里飞了出去。徐海东同志伏在马背上，手握双枪，朝后面追上来的敌人骑兵左右开弓。一眨眼工夫，他骑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我们的马夫班长再也见不着了。从战争年代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徐海东同志深深地怀念着他，到处托人打听班长的下落，始终没有得到他的音信。

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徐海东同志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少将旅长。当时正值首战平型关前夕，他的爱人周东屏生下第一个男孩徐文伯才七个月。这天，徐海东同志把我找去，说：“张金山，找你来商量个事。”我说：“军团长（我总是这样习惯地称呼他），么子事？”“抗战全面爆发了。党叫我带着部队上前线去打鬼

子。你帮我挑着这个小崽，把周东屏送到延安去。”“军团长，我也要扛枪上前线。”我坚持说。“小老乡，我徐家叫反动派杀了六十多口人，只剩下这小崽一个后代了。这次分手，还不知道能不能见面呢！”我听了鼻子一酸，眼泪都出来了，便激动地说：“军团长，你就放心吧。等将来把鬼子打败了，我们再团圆！”

不几天，周东屏同志骑着牲口，我一头挑着徐文伯，一头挑着行李用品，出发了。路上走了一个星期，先到西安，后来到了延安。

后来我才得知：我们走后，徐海东同志骑着他那匹高大漂亮的枣红马，率领一个团配合兄弟部队，一举歼灭了日寇精锐部队坂垣师团。随后，他在朱德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的战役。徐海东同志带领六八七团和六八八团在张店、町店战斗中打得十分出色，毙伤日军上千人。

一九三八年初，徐海东同志劳累过度，犯病吐血。中央命令他到延安治病，他才离开了华北前线。这样，我们分别不久又在一起了。在延安治病不到一年，他进了马列主义学院。一九三九年九月，徐海东同志伴随刘少奇同志告别延安，经西安、洛阳，前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九四〇年一月，徐海东同志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的时候，旧病复发，病倒在皖东战场上。江北指挥部向中央报告后，毛主席立即签署一封电报，亲笔写下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一九四六年，徐海东同志在山东诸城、莱阳一带养病的时候，我当了警卫队副队长。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和罗炳辉

同志常来看他，常谈作战方面的问题。一天，徐海东同志叫我穿便衣到新四军军部去给陈毅同志送一封信。陈毅同志看过信后，关切地问我：“你们首长身体如何？”我说：“首长还是吐血，卧床不起。”陈毅同志马上写了回信交给我。他叫我和他一个桌子上吃晚饭。饭后，我连夜走了八九十里路，天未亮赶到了家。徐海东同志看完陈毅同志的回信后，高兴地对我说：“张金山，你跟我上大连去。”“大连在哪里？”我问。“大连靠海，是个好地方。”他很高兴。九月间，我就跟随徐海东同志一家人漂洋过海，坐船来到了大连。到大连后，组织上送我进了警官学校。至此，我就不在徐海东同志身边工作了。

万万没有想到，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赫赫有名的大将，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悬赏捉拿没有夺去他的生命；而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徐海东同志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郑州含着冤恨离开了人间。但是，我们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党中央为徐海东同志革命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都被推翻了。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勋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将军那音容笑貌，爽朗性格，革命功绩，思想品德，也永远留在我这个老马夫的脑海里。

(王照运 整理)

同左权将军的三次会见

赵 龙 韬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张学良将军命令在东北军内成立一个既利于对日作战，又便于与红军联系的新型队伍——“抗日先锋总队”（即“先锋队”）。孙铭九被任命为总队长，我任参谋长，故得以有机会与闻名的红军代表左权将军三次见面。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亲日派何应钦发布了讨伐令，妄借讨伐，取蒋而代之。这时东北军内部出现分裂，其中一部分部队倒向国民党，致使何应钦得以轻取洛阳、潼关两地。那些日子，南京的飞机盘旋在西安城上空，大有炸平西安之势，内战迫在眉睫。为了制止内战，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西安事变”必须和平解决。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等各方人士的拥护。而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必须加强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为了抑制何应钦的讨伐，由左权将军率领的红军先头部队进驻于西安北部的三原县，并与我们“先锋队”取得了联系。红军在部署兵力时，征询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当时考虑到怕国民党从荆紫关过商县包抄西安。因此，希望红军能派一支队伍占领荆紫关，红军采纳了我们的建议。面对不抗日却热衷于打内战的国民党

反动派的讨伐，东北军内群情激愤，由我负责抓紧了“先锋队”的军事训练，以备迎战。由于“先锋队”里有一定数量的党的外围进步组织“同志会”（我也参加了同志会）的成员，因此对于这样一支生机勃勃的抗日力量，红军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使得这支队伍与红军联系更加密切。

红军，对于我来说，因以前没有接触过，陌生得很。但对于国民党内部那些“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口号，我却是极不赞同的，认为国难当头不论如何，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是中国人。但红军究竟怎样，心里没有底。后来私下里听到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对于我们失去家乡的东北军人来说，还是感到亲切的。特别是对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这一主张，感到是顾全大局、顺乎民意的。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天气很冷。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左权将军却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抗日先锋总队。只见他约莫有三十几岁，身着普通红军战士的粗布灰军装，中等身材，黑乎乎的脸膛，目光炯炯，和蔼可亲。左权将军和我一见面，便热情地与我握手，做自我介绍，并把他的两个警卫员介绍给我们。互相让坐后，就随意谈了起来。是左权将军开的头，他谈了他的经历，还谈到了他是黄埔三期的学生，去过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他那肝胆相照、真诚纯朴的话语在敲动着我的心，使我感到很愿意同他谈谈心里的话。我谈到了我的家乡是在东北，对失去国土、家乡甚感痛苦；叹息我虽是“中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军人，却有武不能习、有枪不能打击日本侵略者，家乡音讯皆无，对家乡亲人们的无限怀念之情。左权将军听了无限感慨，并向我讲述抗日救国之路应该怎么走；目前“三位一体”以及“先锋队”习文练武

的重要性。他的一席话，使我几年来单纯思乡之情转为民族恨，激发出我的抗日热忱及带好“先锋队”的信心。我们谈得很融洽，这虽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他还详细地询问了先锋队的各个方面情况，我也尽可能详尽地向他做了介绍。譬如，在我说明东北军为什么要组成“先锋队”时，将军听得非常认真，听到高兴的地方，几次爽朗地笑了。当他听到“先锋队”的干部是源于东北军的“学兵队”，而学员则源于西安东城门楼的士兵（东城门楼的学兵队的学兵中有一大批是我地下党员）及保卫张学良将军的特务团、东北军百零五师中的青年抗日激进士兵时，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左权将军诚恳地向我表示：红军与东北军是友军，是兄弟部队，“先锋队”是一支很有希望的新型队伍，是红军与东北军联系的纽带。左权将军那种推心置腹、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初次会面的不自觉的拘谨便无影无踪。言谈中确实感到左权将军很有军事素养，颇有政治远见。过去我曾认为红军粗鲁、简单的偏见开始消除。时间真快啊，将军起身要告辞，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道别了。

没过几天，左权将军又来到我们“先锋队”。见面后，我们就象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他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左权将军询问了一些日常情况后，便问：“你们训练战士需要多少时间才可以作战？”我说至少需要两个月，并问他红军需要多少天。他说：“我们两天即可。”我甚惊讶地问：“那你们是怎样训练的？”将军风趣地说：“我们用一天时间教给他们认识作战目标，即谁是敌人；再用一天时间教给他们射击瞄准，即三点成一线，然后马上就可以对敌作战。”多么简捷的回答啊！然而份量却很重，引起了我的深思：红军的

武器装备之劣，训练日期之短，竟能打垮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真真是不可思议的。

送走左权将军，连日来我总是在反复想：身为将军的左权同志，冒着风险，奔忙于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这不就是为了雪国耻解民愁，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抗日，为了进一步巩固“三位一体”的好局面吗！从左权将军的言行中，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沦陷家乡的光明，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即将来临。左权将军的满腔热忱及以礼待人的风度，使我敬佩，久久不能平静。我决心要去回拜将军，更要去看看红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我把我的想法与孙铭九谈了，他很赞同。原来自他亲自抓了蒋介石之后，就早有结识红军的强烈愿望，况且他听说红军将领亲临“先锋队”，这种心情更加强烈了。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寒气依然袭人，渭河水结着薄薄的一层冰，过河的老百姓两腿冻得血红。孙铭九、贾陶（先锋队第二支队支队长，此人当时思想很倾向抗日，是先锋队的骨干，与我是磕头弟兄。）和我相伴去三原县左权将军住处回拜，我们三人坐一辆三轮卡，没吃早饭就登程向三原县驶去。到了红军的防地，我们想应当碰到红军了，可是行进途中并未见到红军的一兵一卒。当时，我有些惆怅，左权将军的部队是不是还在三原县？在接近县城时，遇到打柴的老乡，又看到一个青年，不满二十岁的样子，头戴一顶有五角星的八角帽子，原来是红军战士。我们进入县城时，打听到左权将军的军团部设在一个大户人家。当我们赶到时，门外面并无岗哨，进门后，才看到一位战士。我们向他表明了来意，他便带我们到院内的一幢南房里。这时见到一位军人，

经介绍是参谋长孙毅同志。他热情地把我们让进里间屋子，说明这是左权将军的办公室。孙参谋长让我们坐下后说：“左权同志刚出去，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请稍候一下。”趁孙参谋长去外屋打电话之际，我打量了一下这间办公室：房间不大，屋当中放着一个长桌子，一条长条凳子，此外再无其它，摆设很简单。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如此俭朴，不由得使我敬仰不已。听到孙参谋长打完电话，随即叫通讯员，通讯员不在，他就提水壶亲自为我们去打水。约十分钟左右，左权将军急匆匆地回来了，身后的小警卫员替他抱着灰军大衣，带着小跑跟着他。我向他介绍了贾陶（因他和孙铭九已相识），左权将军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在一起谈到了“西安事变”后瞬息万变的国内形势和西安与南京的对峙局面，他进一步讲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包括对何应钦这伙人也尽量做到不打，一切为着全民族的利益和前途着想。他还特别提醒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防万一。他的这些话使我心悦诚服。当左权将军知道我们还没有吃早饭时，表示很抱歉，便招呼人给我们准备早饭，特意嘱咐为我们炒了两个菜，还多买了几个烧饼。在长条板凳上，我们五个人边吃边唠喀。在我们身后有几个警卫员也端着碗吃饭，有一个小战士还很随便地一只脚蹬着我们坐的条凳棱上，吃得很香甜。饭后，我们又畅谈了一会儿双方部队训练情况。因为双方都另有任务，我们便辞别了左权将军，离开了三原县。

回来的路上，左权将军关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

们要共勉”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萦绕。我们感到有些坐不住了。由左权将军处回来后而新产生的强烈责任感在驱使着我们。我们三人便又赶往渭南地带，视察队伍的战备状况。

同左权将军三次会见，使我内心有很大的变化，着实感到红军是一支顺乎民心的了不起的队伍。回首我们东北军特别是国民党内的军阀作风，与红军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左权身为将军却一切衣、食、住、行犹如普通士兵，而将军与士兵之间又亲密无间，亲同手足。目睹这些看来极为平常的情景，但却孕育着一种新的伟大力量，使我顿开茅塞。红军处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是什么，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红军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左权将军又以他那一颗对党、对民族、对人民无限赤诚的心，感化和教育了我，使我开阔了眼界，对争取国家的美好前途有了信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有了很好的印象。将军对我的谈话一直在激励着我与国民党的黑暗势力做彻底决裂，也为我支持我的孩子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及我以后踏上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石。每当回忆起左权将军，我心里万分感激这早期的革命启蒙人。